

第二章 中國大陸研究與傳播研究——一個背景的描述

第一節 前言

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在「知識社會史」一書中指陳人類知識的生產與詮釋由原始部族中的巫師，再到中世紀的國家、教會，而最後主要生產知識的機構便轉入學院、學校及學會之內，由學院以學術研究的方式生產知識、界定知識。(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2003: 59-109) 然而，學院並非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學院的建制及運作都受到國家機器的規劃與干預，特別是在威權或獨裁的國家體制中，管理及控制愈發明顯。這符合傅大為所言「我們把學術研究本身看成是整個歷史社會脈絡中的一部份，有著它的功能、角色與意義，以及它與社會中各種團體與力量的複雜關係。」(傅大為, 1990: 82-83) 因此，「知識社會學斷言，觀念體系不能只根據其內在自主性的發展來瞭解，必須參考它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方能充分瞭解其意義。」(黃瑞祺, 2000: 52-53)

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論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和知識的生產過程。並非人群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有；剛好相反，他們的社會存有決定了他們的意識。」¹社會存有決定人群意識一語，正可與往後曼海姆所謂「存在決定知識」作一呼應對比，同時，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命題。

基於以上認知，本章將分別整理中國大陸研究與傳播研究兩個學術社群的發展概況，第二節將首先以中國大陸研究為整理對象，觀察這個學術社群在台灣

¹Karl Marx, 1859,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收錄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審, 199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頁 32-33。

呈現出哪些特點；同樣的整理方式也將運用在第三節傳播研究中，以作為第三章進行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料分析時對比思考的依據。

第二節 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

壹、外來和尚會念經？...西方（美國）的中國研究

台灣的學術發展深受西方學術社群的影響，尤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上，早已呈現「學術殖民化」的現象。因此本節在回顧台灣的中國研究發展前，將先簡略整理西方（特別是美國）在中國研究領域的發展景況。

西方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y）最早源於十七世紀時歐洲的「漢學研究」（Sinological Study），那是因為基於傳教佈道的需要所因應而生的一種「認識」。當時主要是由耶穌會（Jesuit）的傳教士引介中國的地理、語言、政府體制、歷史和社會生活各層面資訊，而這樣的方式成為日後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知識份子認識中國時資訊取得的主要管道。（溫洽溢，2002：2-1）此時的漢學研究關注的是中國的儒家哲學、宗教、服儀、語言文化等面向，同時，也未曾出現許多的學術專門術語、模式，可以說，歐洲的「漢學研究」與往後在美國興起的「中國研究」，在知識屬性上極為不同。

中國研究與區域研究在美國興起，最初始還是基於冷戰時代意識型態對峙的國際格局。當時的中國與蘇聯同屬於「共產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對立於美國所主張的「自由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當時美國基於國家利益、開始以國家機器的力量投入中國研究的發展，因此進入二十世紀的二次戰後，中國研究躍升為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顯學研究，加上美國奉行不渝的科學主義精神，從

此奠定了當今主流中國研究強調的科學化、客觀化、實證化、數量化的學科屬性。

在科學典範的影響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中國研究」表現出幾種特點：

1、重視理論與模式的建構。美國的研究社群在看待中國問題時，習慣性的喜歡尋找一套標準、理論來作為解釋的框架，而如果發現該理論框架與社會現實無法銜接時，自然又會創造出新的理論模式來進行解釋。總的來說，隨著時間推移、也隨著中國本身動態的轉變，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一直不斷地再更新原有理論，所展現的企圖，自然是希望能夠掌握中國發展的動向，達到預測的目標。

從歷史縱向的角度來看，美國的中國研究隨著中國大陸本身的轉變，產生了三次的典範轉移；分別是二次戰後至文革爆發所使用的極權主義模式，文革時期到毛澤東去世的多元主義模式，以及改革開放之後至今方興未艾的新制度主義。（石之瑜，1995：53-56；王信賢，2000：25-33）從五〇、六〇年代開始的極權主義典範，到七〇年代文革爆發與結束的多元主義模式，再到八〇年代所興起的新制度主義取向，這幾個典範之間的轉變基本上都是反映出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想像與定義。

2、缺乏歷史觀的西方中心主義。趙文詞（Richard Madsen）指出美國「中國研究」社群受到現代化的學術研究的潛存氛圍（metaphysical pathos of research）的影響，對於「中國」存在著一種「應當邁向西方現代化的路子」，因此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是無可避免的、是無處不及的」。（趙文詞，1999：39）所以，研究者論述背後所透露出的問題意識往往不是「中國本來為何」，而是「中國應當為何」。針對美國學界的缺失，美國學者本身亦提出諸多的反省，諸如柯文（Paul A. Cohen）在反省過歷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研究中所暴露的缺陷，提出研究者應該訓練或具有「中國中心觀」的「移情」（empathy）能力，讓中國的歷史回歸中

國動態發展的本身。(Paul A. Cohen, 1991)

貳、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

如果說「現代化」的預期與假定是影響西方「中國研究」走向的「潛存氛圍」，那麼在台灣，除了因為學術依附而衍生相同的「現代化意識」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敵對意識」的存在。同時，隨著時光推移，政治情勢肇變，敵對意識的內涵也跟著發生質變。下文將以楊開煌（楊開煌，2000）所進行的研究結果為綱，整理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曲直。

基於國共政爭的歷史背景，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Mainland China Study) 在八〇年代末解嚴之前，始終充滿著濃厚地官方色彩，從「匪情研究」、「中共研究」到「大陸研究」、「中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等名稱上的變化始可獲得簡約地瞭解。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發展初期稱為「匪情研究」或「敵情研究」，主要任務係負責對中共政權進行敵情收集、研判，以提供決策高層瞭解中共動態。楊開煌將中國大陸研究從 1949 年至今概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匪情研究」時期、「中共研究時期」及「中國大陸研究時期」。²這三個時期在時間的界定上互有重疊之處，並沒有清楚的時間界線。

² 楊開煌，2000，「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該文收錄在何思因、吳玉山主編，2000，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一、匪情研究時期

首先，「匪情研究」時期約三十餘年，從 1949 到 1981 年，主要從事研究的人員隸屬於官方情報體系，其背景有三類，一為早期共產黨員、二是長期與共產黨鬥爭的國民黨幹部、三則是從事「三民主義」教育和政治宣傳的人員。而此時研究的主要對象為中共中央，研究範圍以中共政治為主，略旁及經濟、軍事領域。在資料親近性上，早期「匪情研究」階段，一般學院內的研究者無法隨意地接近及取得對岸方面的資訊，而與中共相關的文獻亦會在資料上加蓋「限閱」字樣，唯有事先透過申請核可方能閱讀該圖書文獻。以國內最早「靠掛」在學院內的「匪情研究」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例（原名國際關係研究所），翻閱該中心圖書館的早期圖書資料，仍能在封面上發現「限閱」字樣，同時，早期非研究人員欲進入該圖書館也需申請持證始准許進出，這些在資料上嚴格管控的種種限制都顯現出「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特殊性。

簡而言之，此時期的「匪情研究」基本上並不被學界認可為「社會科學」學科，論者皆認為此時的研究方式缺乏方法論上的正當性，研究人員進行研究的方式並非使用可供檢測的理論方法，純粹建立在過去與中共交往的經驗；唯雖如此，該時期對於中共在人事佈局及政策走向方面，卻往往具有傑出的表現，也樹立了研究的權威性。周陽山（1993）在「台灣的『大陸學』研究中」即指出此階段的研究人員皆是以本身與中共交往的經驗，作為動向研判的參考基準，因此以當今社會科學眼光來看雖然不具任何方法論上的正當性，但是不可否認對於中共的「理解」卻是非常精確的，是當時美國「中國研究」學術社群運用所謂「科學的方法論」所得出的結果所不及。（周陽山，1993：270-278）不過，關於研究方法的爭議，筆者以為這是屬於「中國大陸研究」認識論及本體論的問題，究竟「中國大陸研究」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嗎？或者它只是附屬在現有知識分工體

系下的研究對象，因此研究方法自然來自於該學科的方法途徑，諸如政治學方法論、社會學研究方法、歷史學方法論等等。

二、中共研究時期

第二個階段為「中共研究」時期，此階段約有二十餘年左右，時間上從 1971 到 1991 年。根據楊開煌的歸納，在這個階段中有幾項重大事件影響了「中共研究」的發展走向。首先，1979 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美國將大部分的學術資源傾向中共一方，這使得我國留美學生無法在當地找到適合的工作，因此紛紛歸國，這個因素種下了後期「中共研究」在方法論及認識論上爭論的遠因。其次，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後，美國研究者能夠深入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但是我方的研究人員卻仍然只能停留在文獻及文本分析上打轉，因此許多受過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歸國學人便開始質疑傳統方式的「中共研究」的有效性。³另一個重大事件是 1987 年底國民黨宣布開放台灣地區居民赴大陸探親，這使得受到反共意識規範的一般人民有機會親赴大陸，親身接觸大陸的人、事、地、物。但是，學院內研究中國大陸的人員卻礙於法令限制，無法前往大陸地區，這對於中國大陸的「經驗性研究」取向，是很大的斷傷。

總的來說，「中共研究」時期的研究環境已經有著不同以往的變化，此時期的研究人員除了原有的情報體系人員之外，也開始加入本土學院內訓練出來的碩博士生，以及留學歸國的學人。同時，由於研究梯隊逐漸成形，人數增多，為了在原本不多的研究單位中消化初出茅廬的研究人員，民間研究機構也開始慢慢地成立運作。

³ 在由郭華倫所主編的「中共問題論集」一書中，收集了 1970 年代至 80 年代間幾次關於「中共問題研究方法」的討論會議文章，楊開煌認為該系列文章係因為「中共研究」在資料的掌握上不具獨佔性，同時傳統研究方式也遭受到西方學界質疑，因此我方的「中共研究」才開始被迫面對方法論上的問題。該系列討論詳見郭華倫主編，「中共問題研究」，頁 388-426。

三、中國大陸研究時期

第三個階段為「中國大陸研究」時期，時間的分界點是從 1988 年至今。楊開煌解釋以 1988 年作為分野主因於開放大陸探親滿一年，加上國民黨同年舉行的「十三全」將反共政策修訂為「現階段中國國民黨大陸政策」。不過，筆者以為如以 1988 年元旦開放報禁，報紙新聞版面增加，相對大陸方面的資訊亦開始在媒體上流動，官方不似以往具有資訊的過濾權限，同時三年後的 1991 年適逢國民黨解除了長達 43 年的動員戡亂體制，此時的政治氣候和以往有著天壤之別，各種社會運動紛紛走上街頭，以此宏觀面向來思考對於「中國大陸研究」的衝擊，可能更具有解釋力。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1991 年出版一本「中國大陸研究專家學者專長名錄」，內文將研究者所屬之研究領域區分為：「理論類」、「歷史類」、「政治類」、「外交類」、「經濟類」、「社會組」、「教育類」、「文藝類」等八項次領域。其中，在八項領域共 144 位研究人員中，以政治類所佔比例最高（67/144），其次為經濟類（37/144），⁴如果以此比例計，可以發現政治與經濟等領域佔了超過七成的研究人力；同時亦透露出中國大陸研究基於成立背景所延續下的工具性導向。

「中國大陸研究」階段的特徵，主要在於政治及社會開放之後，原有的「中共研究」退去了獨佔性、官方性及神秘性等三項特性，在學界方面，各種學科開始爭相加入研究「中國大陸」的行列，依照原本分類學科的知識體系，例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對中國大陸進行研究，這樣的情形撼動了原有的研究典範，因此「中國大陸研究」在方法論及認識論上也開始產生相應的調整與

⁴ 中國大陸研究專家學者專長名錄，1991，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編印。

轉變。⁵

四、敵對意識與整體歸納

綜合以上三階段的論述，中國大陸研究的學科內涵乃是不斷地在改變之中，然而，無論是那一個階段，我方對於中國大陸研究始終都隱含著一種「情感性」與「認知性」的敵對意識。這個概念是由石之瑜（1995）所提出的，如果我們用「敵對意識」對比中國大陸研究發展的三個階段，他認為過去在匪情研究及中共研究時期所存在的是一種「情感性的敵對意識」，這種敵對意識肇始於國共內戰開始，及至 1949 兩岸分治之後，雙方政權依舊在各種國際場合爭取「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權。但是在九 0 年代之後，也就是中國大陸研究時期，敵對意識的情感成分已經冷淡許多，因為台灣方面已經在法律層面承認對岸政權的合法性。

「九 0 年代以後的敵對意識是靠觀念上建構出來的：一方面，台灣要脫離中共，故必須將中共形容成敵人，以取得兩岸分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中共不接受台灣的主張，故台灣也必須將中共視作潛在的敵人。」（石之瑜，1995：80-83）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發展，從早期純粹擔任敵情資料的研判，逐漸跟隨著社會開放與政治鬆綁而走向學科建制，資料取得的管道也不再限定各種情資文件，開放兩岸交流的九 0 年代之後，研究人員甚至可以親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收集第一手資料。而在學科知識的發展過程中，六 0、七 0 年代雖然發生過東西之間研究方法孰優孰劣的爭論，但隨著歸國學人與日遽

⁵ 石之瑜在其著作「大陸問題研究」中，開宗明義便挑戰「中國研究是否為學科領域」的認識論問題，中國研究是否應該具有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還是依附在現有的知識分工下，以政治學、經濟學等基礎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即可，如果是後者，那麼中國研究是否屈服於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普遍通則論」；亦或者是中國研究本身是一門學科學門，應該發展自己的研究方法，有通則性的解釋亦尊重具有特例的解釋方式，其認為中國研究該有自己的一套標準與認識觀及方法論，不應該只是將西方理論和方法「抓來」套用在中國研究上。

增，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早已經在進入九〇年代後，全盤接受美國式的理論典範與研究思維。

第三節 傳播研究在台灣

壹、源起--美援體制下的反共心戰宣傳與主流典範

相較於「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之創始之初以「仇匪」、「反共」作為存在前提，傳播體制及傳播教育的創立同樣肩負著「反共心戰」的宣傳任務。程宗明（1998）從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切入歷史文獻中，指出台灣的傳播研究及實務機構是一種因應國家發展與反共心戰的綜合機制。（程宗明，1999：389）由於二次戰後國際局勢出現奉行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美國為使台灣能夠有效防堵蘇共及中共的擴張，所以提供美援幫助台灣成立傳播教育及實務機構，以便進行主要的「反共心戰」防衛宣傳任務。因此，台灣的傳播研究機構和實務機構，諸如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系及政治大學新聞所、中國廣播公司、台灣電影製片場等都是在所謂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結構下，擔負整個宏觀「反共」的任務及功能而創設的。

依照程宗明的觀點，在整個政經環境依賴於美國的背景下，實際從事研究的知識生產自然也就無法脫離美國學界的影響。香港學者蘇鑰機也提出同樣的看法，蘇鑰機（1993）在比較兩岸三地的傳播研究發展時指出，從研究人才的培訓、研究主題、取向來觀察，台灣的傳播學界在九〇年代之前一直都以美國馬首是瞻。所以在兩岸三地類型的歸納上，中國大陸是呈現一種「封閉型」的研究環境，香港是「過客型」，而台灣則屬是「行政型」，也就是說，台灣的傳播研究多能夠取得政府經費補助，從事「行政式研究」，因此主題多數圍繞在大眾傳播效果研

究、傳播與國家發展、媒介實務、說服傳播、國際傳播、閱聽人研究等題目。而研究方法也是以記量方分析為主，輔以內容分析及文獻研究。（蘇鑰機，1993：43）

汪琪、臧國仁（1992）針對傳播研究的博碩士論文進行調查分析也呈現相同的結果。1970年之後，大眾傳播、以及大眾傳播相關的幾項主題，如閱聽人分析、傳播與發展及政治傳播等，都逐漸成為主流研究，而在方法上則是以文獻分析、抽樣調查及內容分析法為主。（汪琪、臧國仁，1992：400-403）

何謂台灣傳播研究的主流典範？張錦華（1991）引用吉特林（Todd Gitlin）所提出的界定是：傳播研究的主流典範，根據吉特林（Todd Gitlin）的經典之作「媒介社會學：主控典範」（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1978）一文中的定義為：傳播領域中的主控典範是指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與拉薩斯菲（Paul Lazarsfeld）的研究有關的方法、概念，及結果；亦即針對媒介內容所做的特定的、可測量的、短期的、個人的，態度和行為的“效果”研究。（張錦華，1991：19）而針對台灣傳播研究呈現單一主流典範的現象，林麗雲（1999）從研究「傳播史」的角度，觀察台灣主流傳播典範的形成及影響同時呼籲應該「另闢蹊徑」。林麗雲的研究指出，台灣主流典範的形成，主要是因為接受美援的影響，本國的留學生在美國接受的傳播研究訓練，在學成歸國之後，便將美國的研究典範移植回台灣；而在威權時代的背景下，主流典範中的理論可以用來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如反共宣傳對於閱聽人產生的效果。但是，在台灣社會由政治壓抑逐漸朝向開放發展時，主流傳播典範卻無法針對新興的社會運動（媒體改造運動）與社會議題提出合理的解釋，這是因為傳統的主流典範只注重傳媒的功能與效果，但卻忽略了國家權力分配及宰制的關係，這便是主流典範的侷限。同時，該文也呼籲學界重視研究「傳播史」的重要性，因為傳統的主流典範並不注重宏觀歷史面的縱向及橫向分析，這將使我們的傳播研究只關注在許多片面的斷層，無

法有產生知識的累積。鑑往可知來，只有當我們瞭解自己從何而來，才會清楚自己現在的定位及將來的走向。（林麗雲，2000）

程宗明及林麗雲對於台灣傳播教育、實務體制形成的解釋及主流傳播研究的運用與侷限，兩位作者的觀點正與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相互呼應。在以反共心戰為創設前提的學術環境下，對於研究者產生的知識觀點應該是具有相當的主導性，而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理論觀點，則是趨附於主流的傳播研究典範。

貳、社群自省與新典範的加入

一直以來，傳播學界始終存在著「學門正當性」的討論與思考。從最早的「十字路口說」，到晚近傳播學者開始從更深層的哲學問題上作思辯，目的無非是要為傳播研究找到一個適得其所的學位方位，也因為這樣的關懷，許多關於歷年傳播研究發展的回顧性研究便逐漸出現。翁秀琪（2001）收集並比對國內目前的傳播教育生態，包括各大學新聞傳播系所創立時間、數量、課程安排等要素，藉由觀察這些指標，思考傳播研究在台灣建立「獨立學門」的可能性。翁文指出，傳播研究欲在台灣成為一「傳播學門」，需要的是以一種「本土思維、全球實踐」的問題意識來發展我們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途徑，換言之，傳播學術界必須嚴肅地面對傳播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方法論等問題。（翁秀琪，2001）

台灣傳播學者開始思考並著手整理過去的研究成果，例如須文蔚、陳世敏（1996）於《新聞學研究》撰文分析傳播學發展現況，汪琪、臧國仁（1996）接續過去傳播人力資源的研究，調查 1995 年之前的變化，凡此種種皆象徵著傳播學門早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與侷限，因此從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到理論的建構，傳播學者都希望能夠跳脫過去主流典範的制約，開創新的研究視野。

九〇年代以後，一方面因為學界內部自省的力量，另一方面因為留學歐陸的學者陸續歸國任教，因此不同於主流典範的理論體系也快速出現，其中較為明顯者，當屬「傳播政治經濟學」從理論論述實踐到台灣社會的媒體改造、公共化運動。根據馮建三（2003）的整理，傳播政治經濟學在 1992 年之後被大規模引進台灣學界，而學界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認識與「想像」，也將其歸納為批判的傳播理論，因此在台灣，傳播政治經濟學指的就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簡稱 CPEC）。（馮建三，2003：104）傳播經濟學在台灣緊密地與社會運動扣合，該文指出 CPEC 的論述成功的參與了六起媒體事件，分別是退報運動、九〇一活動、地下電台運動、三退運動、公視正名運動，和公集團電視運動。其中尤其以公集團電視的推動，是以論述實踐先作鋪陳，加上遊說立法與政治力接觸後，逐步地將公集團的內涵具體化為政策推動

除了批判典範的出現，著重於研究者個人生命經驗自省的詮釋典範也在九〇年代中逐漸被傳播學界應用於傳播知識的生產。1996 年，由胡幼慧主編的「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一書出版上市，該書是國內第一本介紹質性研究的本土創作，這本書的出版象徵著學界始終有人不滿於主流典範「機械性」與「公式性」的合理化現狀，而積極構思、創作更具生命力的研究典範。胡幼慧在該書的序言中說：

起意編這樣一本書，主要來自三項動力：首先，是一種對國內量化研究氾濫的感嘆。這種氾濫已使得大部分研究缺乏社會洞察力，對社會的改革更顯得萬般無力。因此，希望引進不同的研究典範，打破此僵局。其次，是來自接觸質性研究後所感受到的學習與成長，並因研究而直接參與社會的脈動，為研究找到了生命力與社會價值。第三，是目睹國內正在萌芽的質性研究論述與出版，大部分仍在「片斷式」、「非批判式」，甚或缺少本土紮根的「番易（翻譯）式」範疇中打轉。（胡幼慧，1996：序 1）

質性研究典範與傳統實證典範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前者主張研究者應介入研究中，在研究過程中找尋個人的生命意義，因此研究的態度上是主觀的，而後者則是謹守價值中立原則，強調客觀、科學。也因為如此，傳統實證主義者常譏笑所謂的詮釋、質化研究是「不科學的」、「不精確的」，而質化研究者也認為實證主義者是「缺乏洞察力」與「合理化現狀者」。

綜合而論傳播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本文選擇程宗明以政治經濟學觀點所得到的解釋，即為了「反共心戰」宣傳的需要，因此在美國的援助之下，從新聞教育體系接續到廣播產業當中。也因為這樣的背景，始得研究者在知識生產的理論、方法工具上，同樣依附於美國學界的研究，換句話說，美國挾其龐大雄厚的政經實力，順利的對台灣的傳播論述生產建立了知識霸權。而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因為台灣傳播學術社群的自省，一方面因為留學歐陸的學者於九〇年代接續回國執教研究，帶回歐陸的批判典範，終於使得傳播研究在九〇年代以後逐步呈現多樣化的論述風格，而研究典範除了傳統的實證典範之外，也加入了批判理論典範與詮釋典範。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整理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發展的不同變化，從西方（美國）的中國研究著手，論述西方中國研究由漢學研究（Sinological Study）走向社會科學式中國研究（China Study）的過程，及其知識內涵。中國研究在美國成為一門顯學，初始乃是基於冷戰時代中，意識型態對峙的需要，而後因為中國大陸本身在政治、經濟方面的變化（文革、改革開放），使得美國基於國家利益而挹注資金發展中國研究。而中國研究被賦予實證化、量化的研究屬性，則是因為受美國科

學主義的影響，不過也因為如此而使得中國研究出現不少缺失，諸如缺乏中國歷史觀、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優越意識等等，這些因素都讓美國的中國研究作品、理論、方法，備受質疑。

在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則是經歷過幾個不同時期，但整體而言，在資料來源方面隨著社會開放而日益多元，但方法與理論觀點卻是逐步接受美國的典範移植，一九六〇、七〇年代雖然曾出現「傳統方法」與「實證方法」的爭論，但到近期九〇年代之後，由於留學美國的研究者陸續回國任教、研究，因此美國式的實證研究便成為當今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主流典範。

第三節整理的對象轉為傳播研究，根據程宗明以宏觀的政經背景分析，發現台灣的傳播教育與廣播產業的創立，乃是基於冷戰時代中兩大陣營對峙的需要，因此台灣接受美國援助成立新聞系所從事反共心戰的實證研究，以提供決策者參考，而廣播產業則兼負反共宣傳的需要，灌輸台灣人民反共意識。

至於在傳播研究的發展上，美國式的研究傳統對於台灣的傳播研究一直處於支配的地位，不過隨著政治上鬆綁、社會力逐漸釋放，研究者早已經發現主流典範的侷限性，因此引進了歐陸傳統的批判理論，尤其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在被引進台灣之後，緊密地將論述與社會運動結合，成功地策動公集團電視運動的進行。

社會科學服膺於政治高壓而高唱反共論調者並非僅止於新聞傳播領域或大陸研究領域，作為基礎學科的社會學一樣出現相同的景況，王乾任（2002）研究台灣社會學書籍出版的歷史，指出社會學書籍由戒嚴時期至解嚴後的發展特徵是「政治力控制力日漸減弱，商業力量日漸抬頭，社會學書籍由批共、反共，缺乏政治議題至多元化。解嚴之後，政治社會學著作日增（壓制到解放）」（王乾任，

2002 : 181) 由是觀之，學術之於政治，具有相當程度的依附性格。常言學術獨立、學術自由，然而，不論在威權時期或是民主時期，學術發展皆與國家需求有著生息相關的聯繫。